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十三期
2011年10月，頁69-93
國立台灣文學館

晉身帝國的焦慮

——從森鷗外的《航西日記》及《徂征日記》之征旅文字出發*

羅詩雲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十九世紀末期日本以明治維新為機運展開全面的「近代化」，其後明治期起積極的歐化主義傾向，與向後的保守思想產生對立的混亂狀態。森鷗外即在此改造背景下赴德留學，從而擺盪於新／舊、現代／封建的浪潮當中。在森鷗外以《舞姬》確立其文壇地位之前，就將1884年8月至1888年7月間西洋留學的航旅經驗，以漢文、日文寫成《航西日記》、《獨逸日記》、《隊務日記》及《還東日乘》等文字發表。森鷗外更於日記中借鑑西方或受帝國殖民的他地，對照當時日本社會邁向帝國發展的內部處境。承上所述，本文將以森鷗外日記的文本探討為焦點，從觀看帝國殖民地的海外渡航文字《航西日記》，與征台隨軍期間《徂征日記》等跨地域的記錄，梳理他對國家晉身帝國過程中的嚮往，以及恐懼日本成為歐美列強「殖民地」的焦慮。而從中發掘日本知識份子初始面對西方帝國文明的態度與自我定位，以及日本崛起後向殖民地台灣投影的諸種想像。

關鍵字：森鷗外、《航西日記》、《徂征日記》、殖民地

＊ 論文初稿曾以〈晉身帝國的焦慮：從森鷗外日記的「東亞」記述出發〉為題發表於「第九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系主辦，2010.07.09-10）。本文修訂稿感謝評論人楊智景老師及提問人廖振富老師、許時嘉同學的指正意見。

The Anxiety of Becoming an Empire: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 of Mori Ogai's *Kosei-Nikki* and *Sosei-Nikki*

Lo, Shih-Yun

Doctor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began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A tendency toward Europeanization was adopted in opposition to the conservative ideals of the Meiji era.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 Mori Ogai went abroad to study military sanitation systems in Germany from 1881 to 1884, and swung between the tide of modernity and feudalism . Prior to establishing his literary status in Japan, Mori Ogai had already published his diaries about western sailing and experiences studying abroad in volumes, such as *Kosei-Nikki*, *Doitsu-Nikki*, *Taimu-Nikki*, and *Kantou-Nichijou*. In his diaries, Mori Ogai adopted the Asian colonies of western empires as comparative subjects with which to illustrate the internal struggle of Japanes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Mori Ogai's two diaries, a record of his overseas voyage in *Kosei-Nikki*, and his review of life in colonial Taiwan in *Sosei-Nikki*. This work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two overriding emotion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concerning Japan's anticipated shift toward becoming a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fear of Japan itself becoming a "colony" of other imperial powers.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face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self-positioning and views regarding colonial modernity and colonial Taiwan.

Keywords: Mori Ogai, *Kosei-Nikki*, *Sosei-Nikki*, Colony Taiwan

晉身帝國的焦慮
——從森鷗外的《航西日記》及《徂征日記》之征旅文字出發

一、前言：邁向帝國主義的日本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日本以明治維新為機運展開全面的「近代化」，[1]不管在制度上或物質文明的精神上，急速謀求去除封建舊弊，邁向資本及近代市民社會結構。為了建立近代國家，和天皇制並行的是「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之後更與「帝國主義化」接軌，彼此相互作用，西方「近代化」的概念和制度也被置入其殖民地之上；明治初期（元年起大約二十年間）積極的歐化主義傾向，與向後的保守思想產生對立的混亂狀態，這個階段也是日本內部從封建體制國家過渡至近代國家的啟蒙期。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認為日本明治時期國家發展就以帝國主義為目標：

> 明治領導層接受地緣政治觀點，認為近代國際關係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二者擇一的體制，沒有所謂中間路線，他們看見西方強國正逐漸併吞非西方國家為殖民屬土，日本別無選擇，為了本國獨立，只好努力轉化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員。[2]

帝國主義、工業發展及民族國家的三個現代化改造背景，森鷗外就是在這樣的國家社會狀態下赴德留學（明治17年），從而交相擺盪於新／舊、現代／封建

1 「近代化」的英語詞根為「modernization」，其含義也包括「現代化」。本文中「近代化」與「現代化」二詞意義指涉相同。日本「近代」的意義，依據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3.11），頁13。註18：「近世之後的時代或封建社會之後的資本主義社會，通常是指幕藩體制結束後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敗戰為止的期間。」

2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頁142。

的浪潮當中，以醫學、文學方面的啟蒙活動作為重點，擁著尊重人性與思想自由的思想變遷前往西方。對於日本知識份子而言，歐美渡航可以說是獲得世界先端情報的一個有效方式，尤其是明治期日本經濟力量尚未強大之際，能夠具備海外體驗的人，莫不是背負著興盛日本之希望的知識菁英。因此，這個階段日本知識份子海外渡航經驗的特點有：一，新知識情報的獲得、二，國民啟蒙、三，自我確認、四，文明批評等。[3]

日本雖促成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不過台灣近代化進程的腳步卻較日本來得延緩許多。在日本統治台灣後，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方才出現第一波受過完整近代教育的知識份子。因此，當時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都用很大的熱情去擁抱這股近代的浪潮，只是他們對這些西方觀念有多深刻的認識，仍待深究與討論。然就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方面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文化運動；另外一方面，也更感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中的「殖民現代性」絕非與西方現代性文明相等同，所以二〇年代的知識份子是在憧憬近代與對抗殖民之間擺盪。

討論森鷗外《航西日記》與《徂征日記》等記述海外經驗的文本之前，必須先定義「現代化」一詞，本文內所討論的「現代化」體驗，是依據森鷗外洋行航經東亞各西方殖民地時，觀看帝國於殖民地上物質、制度等建設層面而來的。而「現代性」則意指在「現代化」後的社會精神，至於殖民現代性的特徵可參照駒込武的說法：「西洋近代文明的構成要素中實際普及的東西以及被控制而未能普及的東西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在這樣的現代化進程中，「現代性」呈現的是帝國對殖民地所進行的經濟與意識形態宰制的失衡。[4]在此定義下，「現代性」不應該是一種絕對性質的價值取向。以這樣的概念觀察森鷗外的渡航日記，討論日本知識份子面對東亞區域中西方帝國現代化的體驗，便能於意識矛盾的時代潮流中顯得深刻、直接。

---

3 芦谷信和、上田博、木村一信編，《作家の世界体験：近代日本文学の憧憬と模索》（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1994.04），頁8。

4 駒込武，〈臺灣的「殖民地近代性」〉，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之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4.05），頁163。

森鷗外（1862-1922）生於藩主典醫世家，自幼學習漢文與日本古典文學，以軍醫、作家、學者等多元身分活躍於日本文化界。在他確立文名之前，就將自己1884年8月出航德國學習衛生學的海外之旅，以漢、日文夾雜寫成《航西日記》，並於明治22年（1889）4月《衛生新誌》發表，為剖析明治時期知識份子西洋體驗內在面向的珍貴資料；至於體驗西方殖民現代性後的殖民統治實踐與視野，則能透過紀錄中日甲午戰爭的《徂征日記》來加以勘察。至於森鷗外日記的相關先行研究，則有自鷗外從軍生涯進行考證的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平川祐弘等人編著的探求作家生命經驗的《鴎外の人と周辺》、《鴎外の作品》、《鴎外の知的空間》系列專書，以及具體就日記考察的遠藤光正〈森鷗外の「航西日記」中の漢詩四十首について〉、上田正行〈「航西日記」の性格〉、〈『徂征日記』に見る鴎外の戦争へのスタンス〉等單篇論文。[5] 承上所述，可見森鷗外西洋渡航與日本爭取殖民地時戰爭經驗之日記記述的豐富性格。因此，本文將爬梳漢文脈絡中森鷗外兩個初體驗的心靈文字——《航西日記》、《徂征日記》，呈現日本知識份子初始面對西方帝國文明的態度與自我定位，以及日本崛起後向殖民地台灣投影的諸種想像。

二、《航西日記》的世界觀

森鷗外自幼家學淵源深厚，父親為藩主家的家醫，母親則系出名門。因此5歲時即開始學習漢文，包括《論語》、《孟子》、五經。8歲便學習荷蘭文，10歲時，為習德語而進入本鄉的進文學社就讀。這樣的語言環境為他日後寫作奠下深厚的漢文脈基礎，所以連載於1889年《衛生新誌》第2號至第11號間八回的《航西日記》通篇以漢文呈現，亦不時夾雜漢詩與和歌。細究

5 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日本東京：平凡社，2008.08）；平川祐弘、平岡敏夫、竹盛天雄編，《鴎外の人と周辺》（日本東京：新曜社，1997.06）、《鴎外の作品》（日本東京：新曜社，1997.06）、《鴎外の知的空間》（日本東京：新曜社，1997.07）；遠藤光正，〈森鷗外の「航西日記」中の漢詩四十首について〉，《東洋研究》167期（2008.01），頁69-97；上田正行，〈「航西日記」の性格〉，《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　文学科篇》9号（1989.02.17），頁15-90（後收錄於《鷗外・漱石・鏡花：実証の系》（日本東京：翰林書房，2006.06））、〈『徂征日記』に見る鴎外の戦争へのスタンス〉，《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言語・文学篇》22号（2002.03.18），頁27-51。

其漢文形式，記載留學前船旅見聞的《航西日記》、滯德學習衛生學的《獨逸日記》（1884.10.12-1888.05.14）、醫務相關的《隊務日記》（1888.03.10-1888.07.02）、學成歸國紀行的《還東日乘》（1888.07.03-1888.09.08）等，其漢文皆無句讀與訓讀加註。齋藤希史認為這樣的文體使用，並不是森鷗外企求有廣大讀者來理解他的日記，而是表現純粹漢詩文的「正統」意味。[6] 又考量明治17年（1884）森鷗外為研究陸軍衛生制度與軍隊衛生學，奉命遠赴德國留學，明治21年（1888）9月始回國的經歷。《航西日記》紀錄起訖正自1884年8月24日從橫濱出港，至10月11日經法國抵德的船旅期間。此際日本正值近代國家體制確立的時代，也就是說森鷗外的青年時期是處於近代日本幕府體制崩壞，明治期大刀闊斧變革的動盪時空之中。就時空環境而言，處於明治時期的森鷗外，其日記選以簡潔漢文體裁記述海外渡航新題材的作法，代表了明治漢詩文脈絡於東、西洋之間環境大舉變遷之際的存在新意，森鷗外可謂身兼明治期漢文傳統與歐洲現代文明二重文脈的知識份子。

明治維新後，日本崛起的國家意識中「帝國主義」並非是最重要的部分，與英國相比一開始日本帝國的殖民論述並未隨著軍事擴張而同時於社會動員，因此帝國與殖民之間的機制顯得較不完整。[7]「經驗」是人進行認知與建構的過程，根據段義孚（Tuan, Yi-Fu）的說法是種「冒險的克服」，由感覺、識覺、觀念三者組織而成的。[8] 與日本晚起的殖民論述一樣，森鷗外抵達德國之前的東亞船旅經驗，也是追趕著同時期國家軍事政治發展而生，觀諸《航西日記》第一日記事：「此行受命在六月十七日。赴德國修衛生學兼詢陸軍醫事也。七月二十八日詣闕拜天顏。辭別宗廟。」[9] 這裡明載了此行出發的原因，是接受陸軍官方的命令前往德國學習，而「詣闕拜天顏。辭別宗廟」的動作則投影了日

6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頁197。

7 Faye Kleeman, “Nishikawa Mitsuru and Bungei Taiw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p.69-86）。

8 段義孚（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7-16。

9 森林太郎，《航西日記》，《鷗外全集・卷30》（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1-1956），頁3。

本天皇國家體制及士族傳統的深刻性。這種航西前焦慮又壯志滿懷的初始「經驗」，及其後對西方文明的感覺乃至觀念的建構，在森鷗外所使用的文體記述上，即顯示出此際日本面臨近代東、西文明揀擇的過渡處境。此外，析論森鷗外漢文體日記的漢詩之作，也能彰顯森鷗外出發至西方世界之前其內在的世界觀：

> 一笑名優質却孱，依然古態聳吟肩。觀花僅覺真歡事，題塔誰誇最少年。
> 唯識蘇生愧牛後，空教阿逖着鞭先。昂々未折雄飛志，夢駕長風萬里船。
> （《航西日記》，頁3）

齋藤希史認為若將大學畢業比作同時代東亞漢文圈（清朝、朝鮮、越南）科舉制度的象徵，即能見出漢文脈中森鷗外的內在意識；「觀花僅覺真歡事，題塔誰誇最少年」此句的「僅覺」與「誰誇」流露出仕隱之間的躊躇情緒。[10] 加之日本帝國成立下協力軍備擴張而啟程的留學之旅，可謂此詩不僅兼具森鷗外自幼學習漢詩文的潛在意識，也表現出明治期日本近代現實感的不安狀態。因此，論述森鷗外形塑個人世界觀的過程之前，假若單單以西方帝國主義來論述明治期日本知識份子的思想脈絡，就會落入以西方近代文明為唯一標準的陷阱中。以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漢文發展脈絡而言，接受文明開化的日本知識份子莫不具有更深厚的漢學教養，[11] 因此在他們直接面對西洋文化衝擊的體驗過程中，深植精神內部的漢文語脈也自然成為應對西洋異質文明的越境資本，或為一種最能表現自我的語言。於此也可想作為何森鷗外的留學日記大部分仍以漢文寫成。而這也是我們必須考量明治日本的漢文脈絡與知識份子精神核心之關聯的原因之一。

明治中期到晚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生產進程，在外來現代化物質基礎下，日本傳統文化與各種西方因素並存且混和，亦有衝突。在這個過程中舊文化形

---

10 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日本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頁148-149。

11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15卷4期（2008.12），頁34-36。另外，漢詩的使用也是當時男子表現自我情感的常見形式，參照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頁26。

式也歷經改造，被其後的世代視為代表日本的精神「傳統」。《航西日記》中森鷗外此時的「傳統」已經有別於以往的新概念，以「天皇」為基底的國家政治體制，導因於日本起初民族國家建設運動對中國傳統或近代西方均採取不完全接受的態度。「天皇制國家體制」恰好轉化為專屬日本國民的「象徵」，確保日本邁向現代化進程的體制安定。日本作為東亞區域最早系統性接受近代制度的國家，起初面對西方就擁有批判及欲求的壓抑性格，迴向東亞又負有文明化使命的態度。所以，明治期的日本知識份子都背負著建構東方傳統與超越西方現代化的兩大課題。就目的地看來，選擇「德國」作為森鷗外留學之處，除了德國衛生醫療技術的進步，還有基於1871年普法戰爭後德國獲得統一，以後進國的姿態急速發展工業與軍事的原因使然。德國的國家產業轉型雖說其起步相較於英法來得晚，但終究在十九世紀中葉至末葉期間趕上資本主義工業化，而邁入列強之林。[12] 德國這種後來居上的崛起態勢，正給予當時仍處於後進國的東方日本，其最佳的發展範式；而在船旅觀看的視角上，漢詩記述則能辨識森鷗外初始的視線便與日本看向亞細亞的視線重合：「絕海艨艟奏凱還，果然一舉破冥頑。卻憐多少天兵骨，埋在蠻煙瘴霧間。」[13] 漢詩文中「蠻」與「冥頑」的詞彙使用，即含有漢文傳統上士人從中土看往邊疆的意圖。上述印證森鷗外的世界不僅是以西方為目標，其日記中的漢文寫作更是一種銜接東亞固有傳統，放眼未來帝國之境的轉化表現。

佐藤春夫曾論森鷗外的洋行是象徵日本近代文學的新紀元。[14] 就《航西日記》紀行中詩作，上田正行分析其寫作類別有五：述志（留學的期待與決心）、使命感、東南亞現實的危機感、對英雄所感、西洋憧憬等。[15] 可見森鷗

12 方子毓，〈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海外政策之發展（1890-1914）〉，《中正歷史學刊》10期（2007.12），頁39-40。

13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頁198-199。

14 竹盛天雄，〈『航西日記』の世界—鷗外、森林太郎の洋行—〉，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森鷗外》（日本東京：有精堂，1988-1991），頁30：「佐藤春夫が、『自分は自分の見解によって明治十七年、若い陸軍二等軍医として 陣医学と衛生学との研究のためにドイツに渡つた鷗外森林太郎の洋行の事実を近代日本文学の紀元としたいと思ふ。』」。中譯：「佐藤春夫『根據自己的見解，明治十七年森林太郎（森鷗外）身為年輕的陸軍二等軍醫，為了戰場醫學和衛生學的研究而留學德國，欲以其洋行的事實作為近代日本文學的紀元。』」

15 上田正行，《鷗外・漱石・鏡花：実証の糸》，頁40-41。

外留學的意義不僅是在醫學、軍事層次，其日記之記述也顯示了他對文學文化的新視野與東亞觀。從牴觸洋夷到積極思考西方現代文明，《航西日記》正是此際日本知識份子世界觀轉變的具體鏡像，同樣面臨走出東亞、迎向西方，追求「日本現代化」的帝國建構問題。其日記文字於過渡狀態下內外糾葛的見聞，亦能概括呈現初始日本知識份子走向世界、尋找國族出路、追求現代化的內外矛盾及省思。

三、當東方遇到西方：論森鷗外對晉身帝國的焦慮

相較於台灣現代化需至一九二〇年代才顯得成熟，日本早在十九世紀已然邁入現代化。然而森鷗外《航西日記》寫成之際，仍處遲於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時間點之上，於此必須先知道此際日本與西方帝國在現代化上的時間落差。觀察森鷗外之日記可以知道無論是出發至德國之前的《航西日記》，還是學成歸國旅中的《還東日乘》，都是透過觀看西方列強於東亞殖民地統治的風習、情勢、制度面向，思考現代性與帝國形構之間的關係。其日記內呈現的不僅僅是歐美表層的物質現代化，也反映出近代西方帝國其精神內裡之於日本實行現代化的影響。

（一）打造新傳統

森鷗外的洋行是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份子共同命運的寫照，自幼和、漢、洋學問的菁英教養，以及明治期至東京的學習經歷，讓他兼具傳統江戶時代醫者與現代都市知識人的自我認知，這樣的森鷗外對當時環境與時代問題的感知是相當敏銳的。此外，在日本建立近代國家推行的「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背景下，國民性從而產生雙重意識：崇拜西方近代化情結、封建意識抬頭。[16] 這樣的國民性格在森鷗外《航西日記》的旅程中可相互對照，其體驗西方文明

16 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頁9：「（一）為了迎頭趕上歐美，日本人產生西方崇拜的近代化情結；（二）天皇崇拜中封建身分意識的抬頭。這裡的西方崇拜，造就了日本的另一種優越意識，即對於中國等東方各國的優越感。」

化，身處異地的經驗，使其爭取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作為衡量自我的標準，並也與自身民族意識產生拉鋸擺盪。由此，解讀森鷗外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書寫，等同於釐清近代日本帝國性格建構的問題。安德魯・戈登曾就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內部所產生的文化焦慮提出分析：

> 由1860年代到1890年代，只不過三十年的時間，日本便崛起成為亞洲經濟火車頭。有人稱之為「亞洲工廠」，這種特徵直到20世紀仍存在。……在1880及1890年代，文化焦慮已浮現，而且緊張程度日益加深，其根據是恐懼在盲目崇拜西方現代性的熱潮下，日本可能失去某些東西。在這種憂慮下，日本知識份子不得不加工趕製一個全新的日本「傳統」。[17]

在日本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打造訴求下，不僅是日本的文化面貌，連帶其經濟及政治體制都在現代化的長期發展之下進行改造，促使日本在社會各個層面莫不產生極大的落差與焦慮。帝國主義原來就是一種對地理施加的暴力行為，透過這種活動，帝國主義得以分配、控制殖民地人民，將其納入帝國主義的運作系統，從中獲取利益的剝削。在控制過程中，帝國主義者以種種的物質文明，使地理條件、自然、人文條件，納入殖民者所欲完成的「帝國藍圖」的空間改造。但在日本取法近代西方帝國的進程中，其政治或文化自主權上卻擁有次於西方殖民帝國的精神結構，為了跳脫這層關係日本勢必打造一個屬於日本新帝國的「傳統」，以獲得立足的基盤。從《航西日記》出發前亟欲成行的記事，就能推知森鷗外對於掌握西方列強現代化的企圖心：「蚤有航西之志。以為今日之醫學。自泰西來。縱使觀其文諷其音。而苟非親履其境。則郢書燕說耳。……汩沒于簿書案牘之間者。三年於此。而今有茲行。欲毋喜不可得也。」（《航西日記》，頁3）

17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頁107。

《航西日記》寫成於明治17年（1884），是屬於日本內閣創設、憲法發佈、帝國議會創始的近代日本確立期，同時間亦是森鷗外接觸西方文明的啟蒙期。此間森鷗外以醫者、軍人、官僚與文人、學者、思想家的多重身分活動，在《航西日記》首發其聲，觀看西方帝國殖民下的東亞諸地。觀看其間知識和信仰必然影響每個人觀看事物的方式，森鷗外在近代日本傳統與追求帝國現代化的相為對立和衝擊之下，自會產生諸多掙扎與矛盾。在力求現代化的國家政策下，原本被歐美各國觀看的日本，也開始企圖去觀看亞洲各國。《航西日記》恰刻繪出森鷗外所觀看的東亞殖民地風景，其與各國風土互動而發的感想都充分表現在日記的漢詩文，當中不僅包括對東亞殖民地的感嘆，也觸及對自我本土日本的思索，以及與友人交相往來抒懷的底層情緒。鷗外曾在日記中談論自己的航西之志：「初余之卒業於大學也。蚤有航西之志。以為今之醫學。自泰西來。縱使觀其文諷其音。而苟非親履其境。則郢書燕說耳。」（《航西日記》，頁3）所以森鷗外早在大學畢業時就有洋行西方的志望，認為醫學技術仍然要身體力行向西方取法。這樣的決心，是經歷過日本政經重大變革與時值近代化歷程的知識份子才有的思考。又，對照《還東日乘》森鷗外的歸途心情：

> 負笈三年歎鈍根，還東何以報天恩。關心不獨秋風恨，一夜歸舟過淚門。
>
> 明主將開上議院，待君馳逐闘才華。別有狂客森其姓，玉樹叢中着蒹葭。
> 四十餘日多鼾睡，不關狂風折檣斜。笑曰慳囊無一物，齎歸燕辭献阿爺。[18]

留學三年返日途中的森鷗外不時自問或自嘲己身能力能否貢獻日本國體，字裡行間較出發前躊躇滿志的《航西日記》來說，內心則顯得莫名的焦躁不安感。森鷗外前後內心狀態的差異，考量其學成歸國的使命感與近鄉情怯的情緒想來也是相當自然的。《航西日記》以觀看東亞諸殖民地回看己身，形構自

18 森林太郎，《還東日乘》，《鷗外全集・卷30》，頁258、260。

我；《還東日乘》則更能呈現學習西方文明之後，以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作為衡量自我的標準，努力達到與西方國家的同質性，但同時還擔心失去自我的民族特性，成為與東亞諸國同等的被殖民恐懼之潛在意識。這種屬於明治期知識份子於日本晉身帝國體驗中的矛盾和交流，透過森鷗外以漢文記述的渡航日記一覽無遺。

（二）西方帝國殖民地的東亞景觀

《航西日記》的路線1884年8月24日從日本橫濱出發，森鷗外與一行十人日本留學生，途經福建、台灣、廈門、香港、交趾、尼泊爾、印尼、新加坡、斯里蘭卡、印度、阿拉伯、埃及，終於10月4日抵達歐洲，旅經法國抵德。竹盛天雄曾分析森鷗外的航西路線：「以香港作為開端，英國、法國、荷蘭等歐洲先進國家，從亞洲向歐洲作環狀的航線。航西之旅，正是詳細確認那些帝國主義侵略後之意義的存在。」[19] 從竹盛天雄分析《航西日記》的航行路線，可以知道森鷗外當時旅途中接觸的東亞，各個皆是殖民性成分極高的土地，而這些地方多為英國、法國及荷蘭的殖民屬地。森鷗外此趟旅程既然具備留德學習歐美文化的目的，自然對歐美列強的動向與作為多所留意，殖民地狀況與戰爭消息都能在日記中一一看見。

《航西日記》渡航過程，對各停留港口都有風景、風俗、習慣、設施、動植物和海岸地形、歷史的記載。論及森鷗外最原初的帝國體驗應屬航西路線的殖民地起點——香港，「午後十時抵香港。燈火參差。漸近漸多。略與神戶似。」（《航西日記》，頁5）森鷗外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聯想到日本的神戶，這樣的投影對照可推想是緣於兩者皆為貿易口岸之故。翌日的日記則記下聽聞清佛戰況（中法戰爭），更加凸顯森鷗外對西方列強在亞洲爭取殖民地的戰爭之注意。之後9月3日鷗外欲訪香港英兵屯舍不成，轉往當地病院巡覽，記載印

19 竹盛天雄，〈『航西日記』の世界—鷗外、森林太郎の洋行—〉，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森鷗外》，頁39：「香港を端緒として、英・仏・蘭のヨーロッパ先進国の植民地が、アジアからヨーロッパへの航路に連環 をなしてつらなっている。航西の旅は、それらの帝国主義的侵略のあとを、つぶさに確認してゆくという意味をもっているのだ」。

度籍士兵病況：「現有病兵十人。皆印度種。以其全員二百。算其罹病比例。則為百之五。其病熱症最多。下利次之。絕無染花柳病者。」然而對照浮動病院的英國士兵狀況：「舶內現有病兵五十人。皆英人。今以其全員千二百。算其罹病比例。則為百之四。其病則黴之與淋為最多。熱症次之。」[20] 在英帝國統治下駐守香港的英籍士兵，得病比例不僅與印度籍士兵相差不遠，病症竟然以性病為最多。日記中雖然未對此現象多加評論，僅如實寫出兩方狀況，但森鷗外從醫學角度的觀察對照英國籍與印度籍士兵的患病狀況，除了見出對英國士兵言外之意的諷刺外，更流露大英帝國軍隊內部殖民階級、種族排序的不平等現象。被殖民者印度籍士兵病徵多源自軍役勞動的病熱症，而英國士兵則多患娛樂遊憩而得的性病，這樣的紀錄暗示出即便是英國如此強大的帝國統治，內部軍隊秩序與醫學程度也不一定顯得分明、嚴謹。主張自己文明地位的方法之一，便是創造他者邊緣化的原始。森鷗外開始對鄰近日本的東亞殖民地產生思考，一方面源自醫官身份以風土病為觀察主軸的自然反應，另一方面也起因於森鷗外對西方帝國統治的學習心理，亦是森鷗外，即日本新帝國慾望之眼的顯現。

幕末新舊過渡的文化焦慮，源於條約改正的近程目標，以及建立近代日本的遠程目標。所以森鷗外《航西日記》除了寫出歐美帝國有待檢討之處外，他也從英屬殖民地香港到新加坡、從印度洋進入地中海的過程，找尋現代化光影。抵達新加坡時眼前所見「港口島嶼星羅。船燈萬點。々綴其間」，便令鷗外大感英人以雄厚資本開港於此，而「扼支那印度兩海之咽喉」一句，則呈現船隻往來川流不息，商貿鼎盛的帝國經濟。其後，在斯里蘭卡的亞丁港又敘「港英人所開。紅海之咽喉也。」航程間陸續所見英國殖民資本的經營，不得不使森鷗外驚訝大英帝國於世界上經濟、海權實力。就僅以上述香港、新加坡的例子而論，西方先進國於東亞的殖民地支配與南洋人情風物，不知不覺就已大大刺激森鷗外的民族意識，激起他航西洋行的社會責任意識與使命感。9月

20 印度籍與英國士兵病況引文，皆援引森林太郎，《航西日記》，《鷗外全集・卷30》，頁7。

13日於荷蘭屬地蘇門答臘作詩：「由來為醫道非易。知期愆期事紛々。」[21] 便是感嘆此次洋行有待學習之處尚多，歸期未定。赴德習醫的森鷗外船旅中用醫學、商業角度考察殖民地的發展，都更加鞏固日本帝國進程下己身對於留學的社會使命感。

《航西日記》裡對他者事物，也就是對西方列強於東亞殖民諸相的探究，其實便是尋求一個外在於日本的視角，以便更能深刻審視日本邁向帝國的每一步。東亞的渡旅一方面使森鷗外追索異地、異情，一方面也在觀異中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對東亞人種、風物景觀的描寫，則不斷凸顯東亞殖民地的次等感，參照抵達新加坡及亞丁港時的描寫：「土人渾身黧黑。肩腰纏紅白布。女鼻穿金環。皆跣足」、「土人褐色。頭髮黃枯。鼻穿金環。衣掩半身」（《航西日記》，頁10、14）透過對當地人種特徵、衣物及風俗的形容，未開之地的後進性印象躍然紙上，不僅襯托同時代日本帝國正突飛猛進的史實，森鷗外更儼然打造一幅野蠻／開化對立的等級層次，鞏固日本在東亞諸國的發言權。

同時森鷗外也依據自我視覺、聽覺、嗅覺等感官，描述東亞諸殖民地街景、風物、氣候及地裡：

> 街上土色殷赤。兩邊種樹似槐。所謂尼泊爾弗樹也。有牽牛花與芭蕉。民家甚矮小。覆屋編扉。皆用椰葉。……土人皆嗜山子。一枚切為四片。以蔓葉石灰并嚼之。不復須劉穆之之金 。故男女齒牙皆黑。山子者檳榔實也。婦女插梳。似我古代物。……暮天雨霽人忘熱。如覺舟中一枕安。夜半房奴吹燭滅。虫聲唧唧迫窓寒。原聞地多蚊蚋。今殊不然。（《航西日記》，頁9）

以上的文字是鷗外依照個人行動次序捕捉異文化氛圍和帝國治理新氣象的感知模式。從土人吃檳榔、家屋矮小等異國風情的描繪，到「原聞地多蚊蚋。今殊不然」的衛生環境進步，可以知道當時東亞諸殖民地在經濟、衛生層面，實質

21 森林太郎，《航西日記》，《鷗外全集・卷30》，頁10、14、11。（頁碼依引文順序）

上雖已納入帝國現代化體系之中，但在鷗外的認知裡文化層面仍居於次等落後的位置。殖民地其知識、人種、風物、交通都在帝國現代化的推動與壓抑下產生極大的文化落差。於是，在此般經濟物質的現代化與政治資本的壓抑之下，形成特殊的「殖民現代性」景觀。透過日記的爬梳，森鷗外其人其文呈現的不僅僅是歐美淺層面的物質現代化，也反映出西方現代化精神層面的利弊優劣。觀看牽連了好與壞，美與醜，悅目與刺眼等其實屬於價值系統的判斷基準。森鷗外觀看東亞的層級區分、評價或是批判，從其留德之前的日記來看，其實已經受制於較大的歷史文化框架之召喚，以及國族認同工程所執行的移置與固著。與他者相對的就是自己，將他者異化也表示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明治時期森鷗外《航西日記》中對東亞殖民現代性體驗的表述，不僅流露出其對於日本成為帝國的焦慮與思考，並且刻劃鷗外於現代性體驗中如何看世界和看自己（或日本）的觀點，也提供一種過渡時期地域流動下的參照範本。

四、浮出東亞地表的台灣：《航西日記》、《徂征日記》中的台灣記述

森鷗外《徂征日記》及《能久親王事蹟》這兩部關於台灣的創作，[22] 乃起筆於日清戰爭隨軍來到台灣之故。《能久親王事蹟》以編年方式寫成，是屬於實錄性質的史料作品；《徂征日記》則以日文為主要記述，當中夾雜短歌、漢詩為輔的私人紀錄。[23] 內容由明治27年（1894）8月至28年（1895）10月為止，採逐日記載，僅紀錄基本個人行事之時、地、物，並記有甲午戰爭、征台戰事的狀況與感想。1895年5月29日至9月22日這駐留台灣117天期間，森鷗外便將其日清戰爭與征台戰役的軍旅經歷收錄於《徂征日記》，除了公務記事，實多有抒發個人感懷的漢詩與和歌。1895年5月森鷗外以「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

22 森林太郎，《能久親王事蹟》，《鷗外全集・卷2》（日本東京：該集刊行會，1923），頁3-122。

23 《徂征日記》有漢詩十首、短歌十二首、短歌一首、俳句四句、連句一卷。

長」的身分，隨樺山資紀總督搭乘橫濱丸登陸三貂角抵台，在征台之戰的軍伍之中與軍醫橫川唐陽，互有酬唱、吟詠之作；6月11日隨軍入台北城，期間大稻埕與滬尾是森鷗外主要活動範圍。日軍攻台之際台灣風土環境險惡，日本軍隊苦於瘴疫疾病，森鷗外身為軍醫部長卻無法徹底改善傳染病猖獗的狀況，因而9月遭到當局留營調職處分且隨即返日，在台期間僅四個月左右時間。[24] 雖然鷗外無法有效改善當時台灣惡劣的風土衛生，然而島田謹二卻帶出森鷗外文學意義上的重要性：「參加征台的森鷗外的創作，可以說揭開台灣的日本文學第一頁。」[25] 在江戶時代漢詩被視為有社會地位及知識的文人文藝類屬，島田甚而認為漢詩是日本領台初期的內地人，與承繼中國漢文脈絡的台灣人之間所擁有的共同文藝地盤。[26] 因此，森鷗外之於殖民地台灣初期的意義與其說是醫學衛生，毋寧是與詩友互以漢詩文吟唱的文藝活動之上。

實際上，考究森鷗外最初看待台灣的立足點，可從其受命隨近衛軍團前往台灣，進行接收任務的前夕所賦和歌討論起：「這名為高砂之地亦是來自遙遠島根的我的巡視之道啊」，[27] 以故鄉日本島根縣為起點放眼台灣的敘述，就能感知森鷗外最初的想法是將台灣放在帝國勢力向外擴張的中繼站。而1895年5月30日隨軍隊登台的森鷗外，5月31日至6月3日的《徂征日記》即充滿了戰爭實境描寫和精神壓迫感的敘述，充分表達日軍征台時「敵人就在咫尺之外」的游擊戰之激烈；1895年9月7日森鷗外詩作〈台灣軍中野口寧齋有詩見寄　次韻〉：

征袍不礙一身閑，幕府名流日往還；戰迹收來詩卷裡，羈愁銷得酒杯間。

24 山田弘倫，《軍醫森鷗外》（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2.10），頁78：「將卒の瘴疫に惱まさるゝもの げて數ふべからず、然も虎列刺猖獗の時期であったが……、九月二日附を以て台灣總督府陸軍醫部長を免ぜられ、軍醫學校長事務取扱を仰付られた」。中譯：「將士苦於瘴疫的狀況雖不勝枚舉，在虎列刺（霍亂）猖獗的時期……，九月二日被免除台灣總督府陸軍軍醫部長一職，並被指示轉任軍醫學校代理校長。」

25 島田謹二，〈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文藝臺灣》2卷2號（昭和16年5月20日），頁3-24。中譯文字參見葉笛譯，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冊3》（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98。

26 同註25，頁97。

27 森林太郎，《徂征日記》，《鷗外全集・卷35》（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75.01），頁172：「高砂のこれや名におふ島根なる遠くも我はめぐりこしかな」

昨聞鼉鼓鳴貂角，今見龍旌指鳳山；好是天南涼氣到，桂香飄處賦平蠻。[28]

此詩寫作的時間點，正值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近衛師團困於彰化無法南進的狀況；8月底瘧疾流行，野戰醫院傷患暴增，衛生隊及軍醫負荷皆極為困苦。[29] 森鷗外身為陸軍醫療衛生工作的相關人員，應當清楚日軍征台時的困窘，其詩文自然對於當時軍隊在異地的處境較為關注。其詩句「昨聞鼉鼓鳴貂角，今見龍旌指鳳山」即點出詩人對戰事的注意，以及期許日後戰事順遂的想望。這樣的描述不僅與鷗外時任軍醫部長的身份呼應，也符合日本欲以殖民地統治建立帝國威望的取向。

然而，由於9月2日森鷗外即被免除總督府陸軍軍醫部長一職，「好是天南涼氣到，桂香飄處賦平蠻」便不禁流露出詩人得由戰地台灣轉任東京的閒適感。不過「桂香飄處賦平蠻」中「平蠻」一詞的使用，仍可交相佐證森鷗外由帝國中心觀看殖民地的差別態度。以此句對照先前明治17年（1884）《航西日記》經台所作的望台絕句二首：

青史千秋名姓存，鄭家功業豈須論。今朝遙指雲山影，何處當年鹿耳門。

絕海艨艟奏凱還，果然一舉破冥頑。卻憐多少天兵骨，埋在蠻煙瘴霧間。（《航西日記》，頁5）

首詩就鄭成功的故事加以聯想感嘆，具日本、台灣混血身分的鄭成功成為抵抗西方殖民主義的象徵，自然亦為森鷗外對日本、自我未來期望的對象；第二首則就牡丹社事件讚頌日本當年出兵軍威，「冥頑」指稱台灣原住民，「蠻煙瘴霧」形容台灣落後的風土環境，這些詞彙都是相對於日本的「天兵」而成立。這兩首絕句雖然只是鷗外途經台灣偶然有感的詩作，但是可以察覺森鷗外旅程

28 島田謹二（松風子），〈征臺陣中の森鷗外〉，《臺灣時報》（昭和15年2月）242號，頁118。

29 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12），頁243-268。

壯志滿懷，企圖重振歐美列強環伺下日本國力的志向，以及將日本作為東亞區域文明開化國的先行位置。

駐台期間漢詩文〈臺灣軍中野口寧齋有詩見寄　次韻〉除了前述所言對於軍旅生涯的感想與帝國中心視野外，亦寓含在外羈旅的個人情緒。觀〈寄懷早川陝南　次其送別韻〉的意念表達：

> 攜手河梁往事悠，南荒歎我久淹留。接天波浪風雲急，滿地干戈艸目愁。
> 方技與期三折臂，世間誰怒一虛舟。峽中烟樹秋搖落，此際相思似舊不。[30]

這首送別詩是回贈曾同在中日甲午戰爭服務的軍醫早川峽南（恭次郎），鷗外對同為軍醫，也曾一起共事的早川寫下「世間誰怒一虛舟」，刻劃征旅生涯的流轉無常。除了藉此詩對友人抒發對離台轉職的掛心外，亦表現出對日軍征台狀況的煩憂，故詩文氛圍顯得低迷孤寂。更因為此詩寫於軍醫部長一職免除的非自願轉任之後，從詩中也可以察知返日在即的森鷗外，他的心情是難以馬上從干戈滿地的「南荒」（台灣）跳脫出來。這樣的情緒正回應1985年5月登台後總督府始政式前兩日（6月15日）所記〈贈鷗外漁史之臺灣〉：

> 欲往隨之水路悠，知君今日駕難留。異鄉分手山川恨，絕島從軍將士愁。
> 飛絮落花吟短袖，鯨波鰐浪盪輕舟。河梁一別雙垂淚，蘇李當年如是否。[31]

詩友亦為同僚的早川峽南之贈詩，彰顯戰爭擴張下台灣作為日本邁向近代帝國成形的一個跳板位置。此際的台灣對森鷗外來說是屬於「絕島」般的異鄉，是一個需要從頭耕耘的天地。而「河梁一別」更以漢代蘇武、李陵兩人於河梁送別的典故，象徵森鷗外將前往邊陲之地——台灣的派遣令。從免職離台前的〈寄懷早川陝南次其送別韻〉回溯至日本征台戰爭開打之際的〈贈鷗外漁史之臺灣〉等二詩，其不加訓讀的漢詩中「平蠻」、「冥頑」、「蠻煙」、

30　同註27，頁180。
31　同註27，頁178。

「南荒」等典故語彙看來，《徂征日記》中森鷗外的基本姿態更超越留學時期《航西日記》帝國成形進行中的精神層次，而具有帝國主義式所謂征服者野蠻／文明的二元基本姿態。是以回歸東亞漢文傳統脈絡來結合日本帝國文明在東亞的先行位置，展開殖民地記述與帝國內士人交際流動的往來。

由本文所呈現的日記內容與島田謹二〈征臺陣中の森鷗外〉一文，可以知道森鷗外對異地的衛生環境感覺敏銳，當中尤其對日本首個殖民地台灣人文風土有深刻的不潔感。從森鷗外和近代日本同時間從外地戰爭中實踐衛生學的經驗看來，森鷗外對殖民統治的基礎認知概念，是建立於風土病控制、環境清潔之上。因而具體層面上，森鷗外之於台灣的現代性意義首先是表現在醫學方面，伴隨征台戰爭帶入現代化醫學用品，並建立組織化的醫學系統；[32] 文化層面上，則開啟台灣的日本文學第一頁，且以《徂征日記》形構了台灣作為帝國擴張中繼點的想像，更觸發島田謹二從事《華麗島文學志》的寫作動機：

> 以《華麗島文學志》為題，真的想研究渡台的明治、大正的日本文學之意義及其實況。那約莫是昭和十年底吧。另一個原因是由森鷗外的來台自然而然地引起的，還有我對處理明治以來的近代文學的方法有所義憤，想要彌補。[33]

對西方的觀感，森鷗外不僅運用《航西日記》建構眼中相對於日本的西方現代文明，相隔6年後的《舞姬》（1890年作）結合自傳紀實與虛構幻想手法，更深入反映當時作者身處這兩種處境之間夾縫的邊緣狀況。《舞姬》以森鷗外赴德留學期間的海外戀情為構圖發表，實際上，主人公豐太郎乃鷗外青年時代內在精神的寫照，開頭言道：「現在回到東方的我並非從前在西方的我，說到學

32 島田謹二（松風子），〈征臺陣中の森鷗外〉，《臺灣時報》（昭和15年2月）242號，頁96。

33 中譯轉引自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頁65。日文原文為島田謹二，〈臺北における草創期の比較文學研究—矢野峰人先生の逝去にからむ思い出—〉，《比較文學研究》54期（1988.11），頁122。

識，我的心更加不滿足。我了解人世的悲傷，知道人心難料，領悟到即使是自己的心也是善變的。」[34] 森鷗外在傳統家族制度與自我之間的對立和衝擊之下，所產生的掙扎與矛盾促成了他的思想與創作，《舞姬》蘊含的反封建性格可謂是森鷗外專對當時代所反映的。討論森鷗外的價值，正在於通過其人其文反映了近代日本社會與知識份子自我的對立，更隱含明治期青年對於國族認同的內面意識及成為現代帝國一員的焦慮。

《航西日記》中的台灣圖像，則寄託森鷗外邁向西方現代化旅途中的遠大志向。《航西日記》對於當時大英帝國殖民制度的暗貶，以及慨嘆西方帝國經濟力量之強大，這些在森鷗外文學文本中也多有鋪敘。如《舞姬》主角豐太郎對官僚體系及僵硬的法律條文抱著批判的自覺態度，以及受到留德期間自由風氣的薰陶，覺察到自己已變成一個「被動而機械性」的人，因此與長官在思想上有了異議。實際上，享受過國外自由空氣的森鷗外，對於要求上下關係井然分明的軍隊秩序也多有不適，甚至造成他與直屬長官石黑忠悳的不合。[35] 從森鷗外這些文本與個人實際經驗，便可勘察出帝國現代化之於當時日本知識份子國族認同與個人意識的衝突與啟蒙。不論是日記裡寄託心情或因私人情誼唱和的漢詩文，還是《舞姬》中陸軍軍醫身分與私人生活情感的取捨刻劃，皆描寫出近代日本知識份子於東西文明交會中，國族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多相拉扯。在日本晉身為現代化帝國的過程當中，帝國內裡的成員也絕非對國家腳步毫無自我意識與省思。

五、結語：對帝國現代性的揀擇

總的看來，若要更詳細地挖掘森鷗外對現代性的前後態度變化，其實再酌參留學德國期間所書寫的《獨逸日記》會更顯完整，但本文主要為扣連、對照鷗外留學前背景，與抵德留學前船旅期間關於東亞諸殖民地的個人紀錄，以企

34 森鷗外著，郭玉珊譯，《舞姬》（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1），頁84。
35 上田正行，〈『徂征日記』に見る鷗外の戦争へのスタンス〉，《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言語・文学篇》，頁41。

圖尋找邁開改革腳步的明治日本脈絡下，越境的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帝國文明的意識糾葛及態度轉變。現代化是明治期日本至上的命題，而《航西日記》是在這個時代基礎之上，觀看西方列強在東亞地區殖民地統治成果的經驗，呈現知識份子首次親身體驗帝國現代化的省思。航向西方之前的東亞船旅是一種與異地時空遭遇的過程，森鷗外日記遊歷文字呈現的不僅僅是西方淺層面的物質現代化，也反映出東亞漢文語脈的精神現代化。在《航西日記》觀看東亞的過程裡，森鷗外以明治傳統的漢詩文敘述西方殖民列強在東亞的權力展現，以及剖析殖民地建制之利弊；觀看殖民地台灣的《徂征日記》則和、漢文夾雜地敘述擁有西方現代性及東洋新傳統的日本帝國，於戰爭擴張時期的殖民想像與征戰愁苦，其中更蘊含未來以台灣為據點面向世界的擴張野心。森鷗外洋行前和隨軍征台的前後時期，展現近代日本邁向帝國進程中面對東亞的不同態度，或許激昂、批判，或許焦躁、落寞，甚或是面對台灣時的企圖心與不安，每一歷程也都是森鷗外確立自我位置的體驗。值得注意的是，從一開始之於東亞的西方殖民文明，森鷗外便非全盤接受無虞，而是能揀擇出西方殖民的現代性當中的本質與問題。

森鷗外曾在其子森於菟留學之際告誡他：「西方人總是一下子就決定人的價值，因此只要稍微表現出認真的樣子，就會被認為是好人，也會得到很多好處。要加以注意。」[36] 或許源自內心對西方帝國現代性的不信任感，牽連到對西洋人性格的負面觀感，致使森鷗外告誡兒子這般在異鄉生活的自我生存方式。從這個細微之處就可看出森鷗外，或者說日本對於西方文明始終是保持有選擇性的揀擇態度。《航西日記》裡東亞諸殖民地的紀錄文字，表達森鷗外共時參照日本本土和外部文化元素的考察眼光，通過與同一地域的其他群體作對照性的比較，賦予初始進入現代化，同時又推行殖民地現代化的日本一種新思維。《航西日記》與《徂征日記》的內容和體裁之對照，則能進一步對比出日本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列強的東亞殖民地與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台灣的自我定位，

36 森於菟，〈鷗外のことば〉，《文藝臺灣》6卷1期（1943.05），頁4：「西洋人は短期間に人間の價值をきめる。だから少し真面目に品をよくしていると、よい人だという事になり利益する所も莫大だ。注意すべした」。

以及於日本帝國光影下對台灣的諸種想像。之於森鷗外個人而言，兩個初體驗的日記：面對渡航新事物的《航西日記》、出征帝國第一個殖民地的《徂征日記》，當中的漢詩文脈絡中不僅顯現明治知識份子內心底層對日本晉身帝國的諸多思考，也能見出日本成為帝國後於戰爭環境之外的風雅，以及森鷗外身為文人與陸軍軍醫身分之間的心境轉變與自我認知。總而言之，可以說森鷗外日記的征旅文字凸顯的不單是個人層次的意義，而且是東亞中的日本與其殖民地台灣時值近代軍事、政治擴張，進出大陸的帝國初始樣貌。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81）。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10）。
段義孚（Tuan, Yi-Fu）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山田弘倫，《軍醫森鷗外》（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2.10）。
上田正行，《鷗外・漱石・鏡花：実証の糸》（日本東京：翰林書房，2006.06）。
日夏耿之介著，長谷川泉解說，《鷗外文学》（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
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森鷗外》（日本東京：有精堂，1988-1991）。
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日本東京：平凡社，2008）。
生松敬三，《森鷗外》（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
田澤編輯部，《白袍下的文學奇才：森鷗外》（台北：田澤文化，2009.02）。
池內健次，《森鷗外と近代日本》（日本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
芦谷信和、上田博、木村一信編，《作家の世界体験：近代日本文学の憧憬と模索》（日本京都：世界思想社，1994.04）。
長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東京：至文堂，1992）。
南博著，邱琡雯譯，《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3.11）。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之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4.05）。
許佩賢譯，《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12）。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森林太郎，《鷗外全集・卷2》（日本東京：該集刊行會，1923）。
森林太郎，《鷗外全集》（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51-1956）。
森鷗外，《独逸日記　小倉日記》（日本京都：筑摩書房，1996.07）。
森鷗外等著，黃玉燕譯，《日本名家小說選・輯3》（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1）。

森鷗外著，長谷川泉編，《森鷗外》（日本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4）。
森鷗外著，郭玉珊譯，《舞姬》（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1）。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
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日本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7）。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学圏》（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
Kleeman, Faye Yu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上田正行，〈『徂征日記』に見る鷗外の戦争へのスタンス〉，《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　言語・文学篇》22号（2002.03）。
方子毓，〈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德國海外政策之發展（1890~1914）〉，《中正歷史學刊》10期（2007.12）。
林景淵，〈日本文學經典作家傳記（3）　軍醫作家森鷗外〉，《明道文藝》373期（2007.04）。
孫歌，〈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台灣社會研究》70期（2008.06）。
陳培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史研究》15卷4期（2008.12）。
島田謹二（松風子），〈征臺陣中の森鷗外〉，《臺灣時報》242號（昭和15年2月）。
森於菟，〈鷗外のことば〉，《文藝臺灣》6卷1期（1943.05）。

（二）學位論文

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

（三）研討會論文

謝崇耀，〈森鷗外及其征台相關作品研究〉，「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論文（中山醫學大學主辦，2006.04.29）。